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

朱义禄 著



3.07

主编 许明

河南人民出版社

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

朱义禄 著 责任编辑 王丹方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巩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680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7—215—03416—X/G·442 定价 16.00 元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顾问 胡绳 季羨林 张岱年 任继愈
汤一介 马洪 冯契 梁披云

主编 许明

编委会 (* 为常务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 王小盾	* 尤西林	* 许明	刘月莲(澳门)
* 汤学智	乔仁毅	陈晓明	陈智英
* 杨匡汉	* 俞吾金	赵宪章	姜涛
康正果	程炳生	谢维和	* 黄晓峰(澳门)

总策划 赵 燐

本书出版得到海口赛达物业开发公司

董事长刘安先生特别资助

06

95
K248.07
6
2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

《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许明

河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这套大型丛书接近完成的时候，将是本世纪的最后二三年了。作为编者，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在充满风风雨雨的百年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上，回顾和展望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辛的然而又是十分辉煌的路程。

应当说，在20世纪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力图全面地在思想、学术、理论上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特别是近百年来，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动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探求他们在推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适时的。这不仅仅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过去在理论上缺少相应的研究，从而削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认定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也因为，我们深信，这项系列工程的展开是对百年中国文化运动的一次自觉的反省和展望。

“五四”以来，苦难的中国在各种阵痛中终于迈开了向现代化前进的步伐。然而，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因袭的历史包袱太

C 236793

• 1 •

沉重，或许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路途，特别艰难和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一切进步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在力图体现历史要求的同时又啃咬着自己的灵魂，急匆匆地锻造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历史没有准备一个成熟的经过现代社会洗礼的知识群体，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背负着责任，探索着前进的。而80年代，所有这些内在的矛盾：历史要求与知识准备、文化传统与社会批判、政治理念与大众心理……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知识分子的敏感心灵又一次经历了深刻的洗礼。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变动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选择的改造落后和分裂的中国社会工程获得了初步成功——尽管经历了深重的坎坷和曲折。五四时期诞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批朝气蓬勃的真正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热忱，深刻地影响和主宰了百年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变革。然而，与“推翻旧世界”的历史任务不同，80年代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是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建设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中国。所以，80年代文化与社会变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困惑，对所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讲，也都是全新的课题。

在沉重的历史负荷面前，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将为有志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学者提供机会，研究在历史变革中知识主体的思想轨迹与社会功能，研究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心灵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历程。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担当起这套丛书编辑任务是一群40岁上下的中青年学者，其

中大多数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经历过“文革”以及80年代的开放改革，与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思想上的种种动荡和痛苦的反复。然而，他们执着地求索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性之路。有了80年代那段特殊的经历，就如他们的年龄所标志的那样，在思想上开始走向成熟了。对现代中国来讲，一种沉稳的理性比之激情更为需要。清理极为复杂的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程，提高到学术理性的层面上去认识一个社会文化的载体——知识者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是建设新文化所急需的。由此，本着“开放、求实、建设”的精神，我们祈望一切关怀当代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支持这项事业并提供意见，惠赐佳作。

到本世纪末，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然而，有什么能比参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更能激起生命的热忱呢？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完成什么，但重要的是他们在做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为序。

1992年6月6日于北京钟鼓楼

自序

有人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黄宗羲“起家”的，诚然。

最早读黄宗羲的书，是1980年。那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从冯契师研习中国哲学史。因需交读书笔记，又听说《明儒学案》是个无尽的宝库，便不自量地对这部110万字的著作去“披沙拣金”了。写好后，极为不满但又限于水平而无法提高。研究生毕业后，便看了黄宗羲的其他著作并作修改。稿经五易，后发表于《哲学研究》上。时在1985年4月，题为《黄宗羲哲学史方法论发微——兼论〈明儒学案〉》。命运是公正地对待了我。因为文章寄出后，碰到了一位以质取文的编辑张智彦女士。

在稍前的1984年，浙江准备出版《黄宗羲全集》，同仁来信问我有无兴趣。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了下来。经过一年暑期的努力，《子刘子学言》二卷终于被我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子刘子”是对刘宗周的尊称。刘宗周是明末著名思想家，有宋明理学殿军之称，是黄宗羲的老师。《子刘子学言》是黄宗羲对老师讲课内容的记录稿。这一发现，令我有如获至宝之感。是书历来文献上只有存目，而不见原书。10年前，资料复印尚未普及，且

费用甚昂。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全文抄录。我冒着酷暑，完成了《子刘子学言》的标点、整理工作。是书后收入《黄宗羲全集》第一册中。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在他的《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一书中，大量引用了《子刘子学言》的材料，据此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意思是要用溯源的方法，去把握黄宗羲的哲学思想，而黄宗羲受刘宗周的影响最深。后来我写信告诉他《子刘子学言》一书发现的艰难过程。他在回信中说：“由您的信中才知道找寻《子刘子学言》有这么多曲折。我很同意您的说法，《明儒学案》的《师说》的确是蕺山之说。梨洲自不可能与蕺山完全一样，不过我的书说明，梨洲其实是尽量紧守师说的，并没有钱穆先生说的晚年有根本改变的情形。”黄宗羲的一些令人费解的哲学观点，确实是从刘宗周那里来的。《子刘子学言》的发现，可充分证实这一点。要补充说明的是，没有上海图书馆陈宁宁女士的帮助，该书的发现是不可能想象的。

1986年，我以《论黄宗羲的伦理思想》一文应征，获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优秀论文奖。由此，从黄宗羲扩大到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大凡市上有这方面的书籍，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购买以了心愿，尤其是他们的全集、文集。1988年7月，在数年资料积累与做了较多札记的基础上，写成了《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共计16万字。相比于现在这本奉献在读者面前的重写稿，那只能算是一个初稿。初稿碰上了厄运，结果是书未出版，不仅未给退稿费，连书稿也追不回。

因为我未抄留一份，存下的是不完整的残稿，或缺掉几页，或少一章节。前后不连贯不去说了，更重要的是无法寻找原先已有的思路。除了第一章的前半部分是原稿略作修改外，绝大部分都是新写的。这也有好处，让我对近年来的学术成果有了汲取的

机会。

每当我完成一部书稿后，常会产生一个怪想法：我希望静静地坐着，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此时此刻，就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刻！1990年撰成《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1991年写好《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后，忽发的怪想油然而生。怪想总是被现实无情地击破的。当好友许明兄充任“中国知识分子丛书”主编，写信告诉我已把这部书收入丛书之内。奇想，一下子便化为子虚乌有了。当此学术不景气之际，文人要出一部书，谈何容易！河南人民出版社以10年时间，推出50部著作的做法，气魄又是何等的恢宏！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在以往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地为人们所认识。对这一关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我岂能袖手旁观？结果就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30万字左右的重写稿。

然本书之范围，实在太广泛了。单单涉及的启蒙学者，就有18位。他们的著作卷帙繁多，难以周览，且研究亦受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诸多制约。如傅山的著作，手头只有《霜红龕集》。去年在太原，参加佛教思想文化学术讨论会，知道山西人民出版社已推出傅山的全集共8册，定价为400元。个人无此财力，我所在学校又未购进。因此，《霜红龕集》便是我的主要依据了。类似情况自不止傅山一人。《黄宗羲全集》、《船山全书》、《方以智全书》，至今都未出全。且我的意图仅仅是，勾勒出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的大致轮廓，以求得对这一时代中处于先进地位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个整体性的认识。失之笼统，少细致深入的剖析，自是在所难免。爱之弥切，责之弥深。真切地冀望同仁对本书提出不讲情面的指责。因为没有争议的世界，是一个冷清清的、缺

乏生气的世界。当我按动键盘，电脑屏幕上跃动着行将结束的字句时，就写下了这些甜酸苦辣皆有的想法。

1993年12月18日作者

于沪上东北隅同济新村扫果斋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华夏文化的金秋季节	(1)
第一节 自我批判时代的降临	(3)
第二节 启蒙思潮的文化审视	(20)
第二章 价值观念的历史嬗变	(32)
第一节 重义轻利的价值体系	(33)
第二节 士大夫商人化的倾向	(41)
第三节 断义逐利的市民阶层	(54)
第四节 功利主义的高扬	(63)
第三章 传统政治文化的严峻挑战	(76)
第一节 公私之辨对“家天下”的冲击	(77)
第二节 平等世界的明媚春光	(84)
第三节 “市井贱夫最有理”	(95)
第四节 科举制度的备受鞭挞	(99)
第四章 思维方式的多元化格局	(108)
第一节 “守一先生之言”的经学态度	(109)

第二节	怀疑原则的弘扬光大·····	(114)
第三节	自得精神与“一偏之见”·····	(119)
第四节	古今与中西的会通·····	(125)
第五章	直扣近代的科学思潮·····	(138)
第一节	从反观内求到道德蒙昧主义·····	(140)
第二节	与科学结下不解之缘·····	(147)
第三节	放眼向外的实地考察·····	(153)
第四节	“穷究试验”的近代气息·····	(170)
第五节	数学化趋向与归纳法·····	(192)
第六章	豪杰精神与经世致用·····	(200)
第一节	建功立业的豪杰人格·····	(200)
第二节	经世致用之学的重光·····	(221)
第三节	启蒙学者的社会功利主义·····	(241)
第七章	审美趣味的时代转向·····	(244)
第一节	情理激荡中的审美时尚·····	(245)
第二节	崇尚真情与个性解放·····	(282)
第八章	逝去的启蒙与不尽的思念·····	(303)
第一节	启蒙思潮的夭折·····	(304)
第二节	光辉创新与回天乏力·····	(318)
第三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回响·····	(335)

第一章 华夏文化的金秋季节

华夏文化，漫漫而悠长，绵延数千年。就古代文明的整体态势而言，有两个先后辉映的黄金时代，这就是先秦和明清之际。打个比喻，先秦诸子之学就如作物的种芽茁壮生长阶段，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则为开镰收割的金秋季节。启蒙学者，作为具有共同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造就华夏文化的金秋季节中，是起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和时代的脉搏共同跳动；他们一个个都是热血沸腾，心潮激动的奇男子，无法容忍鄙陋俗见的学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历来被誉为明清之际“三大家”，是启蒙学者的代表。其实这仅是狭隘的理解，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傅山、方以智、李贽、唐甄、颜元、陈确、朱舜水、袁宏道、冯梦龙、徐光启、宋应星、朱载堉、李时珍、徐霞客……尽管各人所虑及的问题与研究的对象存在着差异，所建树的领域和取得的成就也有着殊别，然而他们都是这一时代的启蒙意识的提倡者，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是不期而然、不约而同的。他们均以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超越同时代人的睿智卓识，勾勒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文化画卷，如同内蒙古阴山山脉上万古长存的

岩画，永远铭刻在神州大地上。

崭新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觉醒，禁欲主义的批判，专制主义的鞭挞，主体意识的高扬，经学态度的否定，怀疑原则，自得精神，学术民主，会通中西等孕育有近代因素思想的提倡，穷究试验的实践精神，理数相倚的科学意识，功利旗帜的高擎，经世致用学风的重光，豪杰精神这一理想人格的呼唤，市民情感世界对传统审美趣味的动摇，个性解放的倡导，风雷之文的鼓荡……构成了明清之际启蒙意识的方方面面，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启蒙思潮。启蒙学者们的著作，不论篇幅的多寡，都称得上是不同凡响的；他们的思想，奇新殊变，博大精深，恰似昭苏天地的春雷，震撼了后世无数莘莘学子乃至近代革命志士的心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宋恕、章太炎等晚清维新派与革命派，均是以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著作，作为宣传变法和革命的思想武器的。连完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体系构建的熊十力，也说他参加辛亥革命，就是读了王船山、顾炎武著作的结果。^①《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船山遗书》、《日知录》、《霜红龕集》、《焚书》、《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律学新说》、《物理小识》、《通雅》、《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牡丹亭》、《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情史》……启蒙学者的著作早已成为炎黄子孙烂熟于心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当我们翻阅这些著作时，不得不考虑文化上的金秋季节是如何来临的，这对理解启蒙学者的心路历程是有帮助的。

^①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三：“读船山、亭林诸老生生书，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举而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谋运动军队。”

第一节 自我批判时代的降临

明清之际，中国古典文化出现了一个收获季节般的景象，是同封建社会进入自我批判时代相关的。马克思说：“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① 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进行自我批判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那就是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地集中在一起且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但该社会尚未达到崩溃或解体的时刻。明清之际，基本上具备了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这就是士人们喜用“崩”、“陷”、“坼”、“解”等字眼来形容当时社会危机的情状的原委所在。万历年间东林党人顾允成惊呼：“吾叹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是讲学耳！”（《明儒学案》卷六十《东林学案三》）以身殉明的刘宗周明知无力挽回败局但仍“欲以垂尽之躯，扶天崩地坼之业。”（《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流亡东瀛的朱舜水认为，明王朝已“土崩瓦解，不可收拾。”（《朱舜水集》卷一《中原阳九述略》）当然时贤学者更喜以黄宗羲的“天崩地解”来概括明清之际的社会情况，这表明当时的社会虽未达到崩溃但各种矛盾已充分暴露出来。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才可能并且有必要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顾过去，用“自我批判”的眼光去分析过去，从而走向新的建树。当然这一艰巨的任务是历史地落在了启蒙学者的身上了。

具体地说，三股社会浪潮——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的并存，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官方哲学宋明理学腐朽性的暴露——互相交织，前后激荡而引起的“天崩地解”的现实，是明清之际进入自我批判的标志。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中的如此深刻的危机使当时一些目光敏锐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亦即启蒙学者，凭着他们的广博的学术修养与异乎寻常的思维方式，对于以往历史与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于当时现实与矛盾的主观概括与描述，作出比较客观、公允、正确的结论来，从而较大程度避免了对历史与现实“作片面的理解”的弊端。

一、狂飙怒涛中的“漏舟”

陶望龄，一位当时小有名气的文人，把明王朝喻为一只在汹涌澎湃波涛中行驶的“漏舟”：

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犹幸无事，濡衣褐，解幘被，叫呼狂顾，塞此溃彼。假令风济彼解，犹幸无事，万分有不幸，冲飙狂涛，又震击之，虽有童昏之人，犹知其难也。（《歇庵集·因旱修省陈言时政疏》）

陶望龄在万历年间所描述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崇祯年间。这从文学家冯梦龙的话中就可看出：“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急，舵师楫手，兢兢业业，协心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间诟谮乎！庙堂隐忧，无大於此。”（《甲申纪事·自序》）自隆庆、万历以来，明王朝这只在汹涌澎湃的社会危机的波浪中的“漏舟”已苦苦挣扎了相当长的时候，但中国